



秀『老物件』
传承好家风

一个老物件，就是一段无声的历史，这份来自旧时的记忆与温暖，经八位作者深情讲述，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他们的好家风。

缝纫机伴我一生

王安芬

家里添了缝纫机，在上世纪70年代那可是一件大喜事。尤其是像我这30多岁，有三个孩子的家庭，就如雪中送炭。

1974年我在太原印刷厂工作。一天，我的班组长郭凤山师傅送给我一张购物券，说是他爱人抓阄抓到的，是一台上海产蜜蜂牌儿缝纫机。拿到购物券我发愁了，没钱。为了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必需品，我们向储金会借了80元，加上刚发的工资115元，就把这台名牌大件儿咬牙搬了回来，视为珍宝。

踩蹬缝纫机不难，有说明书指导，我仅用一个下午就学会了直线、拐弯儿，还做成一双鞋垫儿。但是要做衣服就得拜师请教了，我先借来书自学，又利用业余时间去厂对面的跃进服装厂门店请教。为此我结识了那里的朱师傅和黄师傅，他们手把手教我先识别材料纹理，折叠剪裁角度，留多大缝头，还有挖口袋、上门襟、上领子、做裤腰，从简到难，不厌其烦给我示范。我在正规师傅的亲手指导下，学会了许多专门技能，给孩子们做了许多翻新改制的衣服，我一天天地进步，初学的劲头让我沉醉其中，快乐无穷。

我学会做西装男女裤，师傅们鉴定我做的成品已达到他们店二级工的水平，可以拿的出手了，于是我就发动起我们班组的女工给单身职工缝补衣服，拆洗被褥，有的还真买下布料让他做裤子，多少夜晚通宵达旦，乐此不疲。我还被厂工会评为“学雷锋的三八红旗手”。自从有了缝纫机，我上街开始买布头、关注橱窗的展品，看电影时关注时髦的服装样式。我尝试着自己设计儿童服装，记得那年夏天我给两个女儿做了一对“长短裙”，在学校引起家长和老师的关注，衣服常常被借走或试穿，女儿们常回家高兴地告诉我，老师说你手巧、能干、漂亮。

在穷日子里，我教孩子们乐观向上，干净利爽就是美。老话儿说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老大穿罢，老二穿，补好再给老三穿。是这台缝纫机帮助我把简单的生活编织得充满诗意！是这台缝纫机帮助我扮靓了全家，也是它教会我珍惜布头边角料，利用针头线脑陪伴我度过那清贫的岁月，让生活变得有声有色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可是我还记得女儿出嫁时和我开的一个玩笑，她向我要缝纫机做陪嫁，理由是：“见缝纫机就能想起小时候妈妈为我做花裙子的模样。”我说等我百年以后再给你，如今女儿家已买下自动小型缝纫机头，放在桌面上就能操作，她是给洋娃娃做打扮的，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吧。

这台保存完好的缝纫机，现在摆放在我客厅的角落里，我还时不时做些小手工。做个枕套，做十多个花围裙，送给老朋友，打扮自己家的沙发、转椅，最近我又做了三个枕头，一套被褥，送给外孙女，因为她让我当上太姥姥四世同堂了。这台缝纫机陪伴我几十年啦，它承载了岁月的更迭，见证了师徒的情分，它有热度，有情谊，是我家的成员之一，是我珍爱的传家宝。

一份任命书

春 潮

我家几代人传承的家风是公正做事，清白做人。这要从我父亲说起，父亲是一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。他在工作岗位上遵纪守法，勤奋廉洁。

由于父亲公正做事，清白做人，在其30多岁时就被太原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任命为：人民监察通讯员。当时的太原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，负责政府各部门的廉政建设，就连对其通讯员的要求也很高，明确规定：所选任的通讯员必须以身作则，严守国家法纪。与此同时，通讯员的责任也很重大，负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。

我现在珍藏的任命书，是1954年4月6日由太原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颁发给我父亲的，监通字第283号任命书，这是对我父亲工作、人生的肯定。父亲对工作那是认真真，公私分明，当时虽然他是一个人一间的办公室，桌上就有许多信封、信纸，但是绝不容许子女私用一张，就连墨水也不允许我们用一滴。可是当单位需要时，他就会尽力而为，上世纪50年代，单位举办公益事业，需要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占用一间房屋，父亲二话不说，马上把我们家居住的两间房子，腾出来一间，以便让公益事业得以顺利开展。从此我们家的三代五口人，就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了三十多年。

自从我父亲开始，我们家就把这份《人民监察通讯员任命书》当做传家宝，用它来教育后代，警示后人。我们姐弟俩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，勤勤恳恳，做出了各自的成绩，并且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我们还要把这个传家宝继续传下去，传给第三代、第四代……

妈妈留下的毛衣针

陈士琴

我家有好几样老掉牙的物件，都是妈妈留下来的。打开衣柜，拿出那一把我保存多年的长长短短、有的已经弯曲的竹毛衣针，不禁又想起了我亲爱的妈妈……

妈妈心灵手巧，爱做女红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妈妈一有空就拿着那些粗细不一的毛衣针，在手上飞快地编织着各式各样花色的毛衣。看着那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毛线，没有几天就变成了一件漂亮的毛衣，我常常惊叹不已。有一段时期，妈妈还靠着为别人打毛衣挣点买菜钱。

妈妈不仅会编织毛衣，还爱动脑筋学习设计出新的花样。记得上世纪70年代妈妈到矿区居住的日子。有一天，我和妈妈上街买菜，快70岁的妈妈突然快走了几步。原来她看到前面的一个孩子，穿着一件款式很新颖的毛衣，她想追上去看看个究竟。我叫住了那个女孩，妈妈翻来覆去地盯住孩子身上穿的毛衣看了一阵。回到家中，妈妈问我家里有毛线吗？我说有，不多的一些红色腈纶毛线。拿出来一看，确实不太多。“没有关系，你再找点黑毛线吧！”妈妈说。我又翻出了两团黑色的旧毛线。

几天过去，一件图案别致的红黑毛线相间的新毛衣完工了，女儿穿在身上高兴地跑来跑去。妈妈说，我只是看了一下记不全了，琢磨着怎样合适就行了。

没有多久，妈妈又去大姐家帮忙去了。那天，爱人下班回来，连工作衣都没有换，我们就带着孩子穿着新毛衣去拍了张照片，给妈妈寄了过去。

后来，这件漂亮的毛衣，两个女儿都轮流穿上了。

再后来，妈妈把从南方带来的竹子毛衣针传到了我的手上，可编织毛衣的本事，比起我的妈妈就差得远了，我只会编织一些简单针法的毛衣毛裤。但每当拿起好像还留有妈妈体温的毛衣针编织毛活时，妈妈勤俭持家宽厚待人的形象，常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这种家教也让我受益终身。

拨珠见家风

彭庆东

家中柜子的一个角落里，放着一把红木做成的算盘。据父亲说，他的爷爷曾带着这把算盘，背着褡裢走过包头。

算盘长约30厘米，宽约15厘米，四周用铜皮包角，由于长年累月的“精打细算”，每一颗算盘珠子都被打磨得乌黑发亮，透着亮闪的灵气。打我记事时，就看见算盘珠子在爷爷的手指尖上翻飞，算盘像炒豆一样噼啪作响，听来甚是悦耳。爷爷是打算盘高手，年轻时，他是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，携一把算盘参加了1950年初地方政府的土改运动，在对全村房产、家具、耕牛、农具等清点统计方面，都以他算盘珠子显示出来的数字为准。他没有出过一次错，也没有因此贪占过公家一分钱便宜。1953年，县里颁发新中国第一代土地房产证，上面所填写的田亩和房产数据，都含有爷爷统计的辛勤汗水。村里分东西或统计什么账目时，都能听见他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

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，父亲也很早学会了拨打算盘，后来他到太钢的一处采矿场当会计，爷爷便把算盘交给了父亲，父亲则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算盘，同时，他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算计着公与私、勤与惰的账目。我读小学三年级时，有了珠算课。但下学回家后，父亲仍然教我珠算口诀，告诉我怎样运用算盘做加减乘除法，父亲感到他的“数学”在我身上有了用武之地。在父亲音乐一般的算盘声响和教诲声中，我渐渐成长，在一次学校组织的珠算比赛中，我还获得过一本笔记本的奖励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真是令人愉悦不已的事情。不过，父亲最多的时候还是借算盘给我说事：“做人做事，要像算盘算的数一样清清白白，不贪不占，不乱动珠子改变数字；当然，其他方面不能像算盘一样，拨一下才动一下，要积极主动。”原来，算盘上还有如此多的人生准则。

我工作之后，虽然没有再用过算盘，但闲暇之余，拨动一下那些闪亮的算珠，父辈们的教诲便会浮现在眼前。算盘珠子中的家风世理时常诫勉着我：工作中勤恳规矩，生活中勤俭持家。

外孙上珠算课时，我没舍得让他将这把算盘带出家门，但说事说理时，这把算盘是最好的教具。在迅猛发展的电子时代，我在努力地传承算盘里的家风，也算是对父辈们心愿的慰藉而已吧。